

# 十年來的匪俄衝突

王松泉譯

原文載 Nato's Fifteen Nations Dec. 1966

匪俄間的爭執，大體來說，開始於俄帝召開第二〇屆共黨大會。該項會議召開於黑魯曉夫宣佈史達林各項罪惡之後，對於共產世界日後之進展有着極嚴重的影響。然而廿屆共黨大會，在匪頭子挑起此十年前尚屬同一集團的兩大勢力間的衝突之真正原因中，究竟佔有多少份量呢？

匪俄衝突，自始就存在於它的本質中。除中俄兩大民族的互不相容性業經馬克斯主義證明根本無法解決外，尚有成立時間先後的因素：至一九五六年俄帝已有三十九年的歷史，而毛匪僅成立七年；即以目前來說，俄帝已成立四十九年而毛匪也不過十七年，此點亦暫擱置不談。另一因素是：共匪對俄帝意圖與美英獨享核子武器一事，懷有極端的憤懣。此可由匪外交部長陳匪毅以前發表的有關談話中獲得一些端倪；他說：「蘇聯已經拋棄了中共；它對待中共之壞，和二次大戰期間美英對待法國的情形相差無幾」。目前共匪雖然已經成爲核子武力國家之一，但它和法國一樣，始終未能對過去所受的屈辱釋懷。

十年來，匪俄衝突是從兩方面同時發展的：一是屬於匪俄兩個國家間的關係；一是屬於匪俄兩個共黨間的關係；雙方都想在「世界革命運動」中爭取領導地位。然縱使俄帝在此一複雜鬥爭中，已經成功地保持着大部陣地，可是共匪却仍有極重大的收穫：第一，它在俄帝反對之下，仍能成功爲核子國家，由此又牽涉出許多有關的國際政治問題；第二，即或共匪不能贏得其他國家共黨的支持，但俄帝仍不能承認它在共黨世界中已失去了政治領導地位。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儘管面對它在共產主義理論上的對手，

但目前共匪一如十年前一樣，在昇高衝突和挑戰上，它仍握有主動。此種裂罅如果尚未公開地達到高峯，那只不過是因爲共匪爲了便宜或宣傳的緣故而願遵從「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統一」的傳統而已。

## ● 俄帝的情勢 ●

俄共頭子們極可能直至數年以前對匪俄衝突之解決仍懷有一種幻想，認爲共匪把黑魯曉夫目爲最醜惡的人物，因爲黑魯是「與資本帝國主義成立諒解」政策的化身而出賣共產革命事業；一旦黑魔解除一切權力，則雙方必能言歸於好。然在面對共匪的冥頑不靈與瘋狂之下，無論情勢如何俄共頭子們也不得不改弦易轍了。

由下述俄帝稱爲「密件」的兩篇文字中，可以明白地看出它對此事的意見和憂慮：

第一篇標題爲：「中共的全面戰略」。會刊於俄帝專供將級官員閱讀的理論性雜誌「軍事思想」上。文中敘述了俄共頭子們對共匪「民族主義的盲目愛國主義」及其全面戰爭威脅的意見，說：「中共冒險主義者的『全面』戰略，對所有民族，包括中共本身，含有難以言喻的禍患。」同時，又指責共匪不面對現實，祇一味地採行不負責任的煽動政治；此指共匪面對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仍繼續咒它是「紙老虎」。

第二篇文件較第一篇發表的時間更近，因而更具重要性。這是俄共中央委員會對其各地支部發出的通令。函中明白地指責共匪應對匪俄恢復正常關

係會談之失敗負担全部責任。尤其更重要的是在函中洩露了共匪曾堅決拒絕與俄帝合作發展核子武器與征服太空；拒絕繼續與俄帝商談疆界問題以致邊界糾紛層出不窮。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指責共匪欲利用越戰挑起美俄間的軍事衝突，以達其「坐山觀虎鬥」的目的。

從各種角度來判斷，目前俄帝當權的共黨頭子們對於世局的判斷顯然要比黑魯曉夫較為冷靜。實際上，共匪如果能在一九六三及一九六四兩年內可以在國際共黨革命運動中獲得成功，則隨後兩年——尤以一九六六年的情勢必會較為安定，甚或可能轉為親俄。然相反地却是俄帝獲得了三項成就：塔什干幹旋印巴糾紛，謝里賓的出使河內及在哈瓦那國際共黨會議中決定孤立親匪之少數共黨國家。

在共匪爆發「文化大革命」以前，俄共頭目們對共匪祇抱懷疑態度，祇着重於攻擊毛匪的個人英雄主義。然「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暴亂已迫使俄共頭目們不得不加強他們的立場。目前俄帝的新聞宣傳機構已公開直接地攻擊共匪，甚至將「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過激暴亂行為和德國納粹的罪大惡極相提並論。

### ● 共匪的情勢 ●

共匪的外交政策，大體上是依附於其內政政策。而其內政政策則顯得極為矛盾：一面厲行教條主義和清算鬥爭，然工業和農業方面却極偏向實用主義的路線。至於共匪對俄政策，除在黑魯曉夫倒台後有一段平靜時期似在等待俄帝改採不同路線外，其後又恢復了其一系列的對俄攻擊，指其為帝國主義國家，並罵俄帝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特務份子。

共匪進行「文化大革命」之前，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同時刊出了以「對蘇俄共產黨新統治階級的駁斥」為題發表最刻毒的攻擊言論；其大意說：「蘇俄新統治階級不僅忠實地追隨黑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且更變本加厲；因而徹底破壞了國際共產黨共同團結的基礎。」同時又譴責俄帝「綁架其他共黨國家，驅使其遵從美蘇合作政策，以便統治世界；利用越南問題作為它和美國討價還價的重要資本」。

共匪在宣傳中利用越戰問題，實為吾人探討共匪頭子們意念趨向的一項

極為重要的因素。一位中央問題專家曾說：「共匪對於越戰的態度係基於下述的原則：如果沒有戰爭，則必須發明一個戰爭……從越南問題，顯然可以證明：共匪在宣傳上堅持「戰爭不可避免」的主要目的，與史達林在世時所創造的「資本主義包圍蘇俄」的論調，有同樣的蠱惑作用。」

共匪對「蘇俄修正主義」的反復抨擊，使匪幫頭子們有表白彼等確屬共產主義最忠誠信徒的機會。從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共匪「人民日報」貶抑會獲諾貝爾獎金的蘇俄作家索羅柯夫的社論中，亦可得到證明，它說：「爲了追求屈辱的和平、反對戰爭，索羅柯夫認爲戰爭與和平及個人幸福是絕對相反的。」然共匪的高級軍事頭目們究竟是否真正相信：祇要使用「人海」的原子彈，祇要從毛匪著作中獲得靈感，便可以所向無敵呢？

吾人不難看出，目前共匪的「文化大革命」並未發明任何新花樣，祇是重彈「毛澤東主義」最荒謬的舊調而已。

最後，吾人亦應能觀察到，大陸隣接俄境各省尤以新疆地區多年來所醞釀着的種種暴亂，使匪俄間已存在的緊張關係更加惡化。然俄帝究與此類顛覆活動有無連帶關係，可從下述的事實求得解答：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度新德里電台廣播，已有五十餘萬新疆居民逃抵俄境。而共匪自亦不會放鬆此一機會，抨擊俄帝鼓勵各地暴動並喚使大批當地居民逃亡。

### ● 匪俄衝突的結果與影響 ●

目前匪俄衝突，顯然會與過去一樣亦無法避免其深刻影響到今後數十年世界局勢。它已使共黨集團在團結上、及俄帝在共產世界中的領導地位上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由於匪俄衝突所引起的種種結果，已使共黨本身感受了它的影響，主要的是在匪俄政權內部的演進方面，而此種影響的路線常是曲折矛盾的。

因此，共匪的威脅已阻延了俄帝內部自由主義化的進展，同時並迫使俄帝趨向與美國做事實上的聯盟，因而加強了俄國人民與西方更加密切接觸的希望，於是在俄帝的統治圈內造成一種心理上的不安。

對於共匪來說，匪俄衝突已引起了共匪內部對匪黨及軍隊以及新智識階級份子的定期清算鬥爭。所有「修正主義特務份子」都按照他們所犯的錯誤遭到譴責——無論「錯誤」是真，或僅憑想像而來。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毛氏王朝」的內部演進已經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吾人應該還記得俄帝政權亦曾經過相似的演進階段，那就是在俄國大革命後十七年（一九三四年）所開始的史達林大學清除異己。迄至目前為止，兩者主要不同的地方，祇是史魔較毛匪更形殘酷野蠻而已。

然最主要的是在共產世界中，尤其在東歐方面，匪俄衝突已經激發了強烈的劇變。在莫斯科與北平兩者之間能有自由選擇、甚或逕行遵循自我路線之可能性，已在以往的東歐共產集團中徹頭徹尾地造成一種新的形勢。然恰與一般人所猜測者相反，在東歐並不是那些史達林主義者擁護毛匪的觀點，同時也不是那些修正主義者支持俄帝；反之，却是那些「史達林主義者」在聲援黑魯曉夫的反毛運動上，比起「反史達林主義者」來更加激烈而無妥協

# 蘇聯經濟革命批判

李永久譯

本文譯自 Wellesley 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兼哈佛大學蘇俄研究中心研究員 Marshall I Goldman 所撰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原載本年春季 *Foreign Affairs* 季刊。(譯者識)

在共產革命五十週年紀念的前夕，俄國人正在從事於另一個經濟革命。柯錫金 (Alexei Kosygin) 總理業已宣佈：到一九六八年，利潤、銷售及投資報價行將代替定額完成，作為蘇聯每個廠商成績的主要標準；但他對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幾乎隻字未提。此外蘇聯的經理們勢必為自己所用的資本付出利息或資本稅。利潤行將以利潤共享的方式分開，而且若干企業甚至勢必付出地租稅。據俄國經濟學家褒曼 (A. Birman) 說，經濟改革的意義，只有一九二一年轉變新經濟政策與一九二九——三二年實施五年計劃可以相比。顯然蘇聯現在的企圖等於是揚棄過去神聖的原則。

蘇聯人為何選了這個時機作這些基本結構的變化？這不是一種魯莽的行動。呼籲改革起源於李伯曼 (Eyssei Liberman) 教授，時為一九六二年九月。接着是三年至四年的積極辯論與大約兩年的實際試驗。在此期間中，大多數俄國經濟學家終於承認有作一種斷然改革的必要。當其看到在七年計劃

餘地。此種現象說明了每當牽涉到權力鬥爭時，共產黨徒們便把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置於次要地位。

最後，匪俄衝突已經阻止了共產主義在非洲落後地區中預期所能達成的進展。印尼共黨親匪份子的慘遭失敗，已經打破該國的權力平衡。吾人尙能預見到其他現存權力關係的轉變，但不必担心莫斯科方面會因共匪地位的動搖而獲利；反之亦然。匪俄衝突正將使其兩敗俱傷，並逐漸消滅了兩者獨霸的特性。

設非共匪突然發動瘋狂反常的文化大革命，致對世界均勢造成一種新的威脅，則匪俄衝突的結果實是值得吾人大為快慰的。

(一九五九——六五) 期中經濟成長率大為減退之時，他們顯然震驚。大多數觀察家看出，經濟成長率的長期上升有賴於若干基本問題之解決。所需要的是改進日常的作業程序與改良長期變革的歷程。這些，需要一種更有生產力的使用國家資本與革新刺激。

一九六〇年代早期，蘇聯經濟已經變成一種很複雜的結構，而且有勒死自己的嚴重危險。中央的計劃者發現如無工廠經理的幫助，越來越難作有效的決定。不測事件太多，使莫斯科不能為這些事件作出計劃。而且中央計劃者仍然堅持瑣屑地控制日常作業。工廠經理更動數量計劃之權甚小，這些計劃通常在一年多之前擬訂。此外，往往由於一種指導錯誤的獎勵制度，使工廠經理生產完全不適當的產品。這種制度沒有反應錯誤的機構。通常關心官僚的成份多，關心工廠顧客的成份少。不錯，這些方法已經產生過去的成長，但是增加的產品却與需求無關。

過去大半由於壓力與刺激，業已獲致成長與變化。因為計劃者與經理們幾乎都總是淹沒於其日常作業問題之中，而且沒有遠大的目標，政府必須連